

1950年代初期中国上海的小报文学研究

—以《亦报》、《大报》为考察中心

布莉莉*

- 一、《亦报》、《大报》概况简介
- 二、小报散文：“身边文学”与“历史掌故”
- 三、连载小说：通俗文艺的当代延续
- 四、小结

〈국문초록〉

타블로이드 신문 지면에는 신변의 자질구레한 생활상을 서술한 “생활에세이”와 史料를 심심풀이로 살펴보는 “掌故文字”, 그리고 시민의 감상 수준에 부합하는 통속문예작품이 대량으로 실려 있는데, 이러한 중국인민공화국 문예작품과는 상대적으로 이질적인 문학 성질(예를 들면 鸳鸯蝴蝶派 문예작품이나 通俗海派 문예 작품 등)은 사실 사회주의 문학시스템의 구축을 따르지 않았기 때문에 바로 조정 개편되었지만, 한 쪽 구석에 조용히 자리 잡은 潛在的 隱居狀態로 묵묵히 존속하고 있었다. 그러나 이런 문예작품들은 1949년에서 1952년 사이에는 비록 대단히 非對稱的인 경쟁이긴 하지만, 실제로는 “새로운 人民文藝作品”에 대한 제한적인 경쟁관계를 가지고 있었다.

핵심어 : 《역보 亦报》, 《대보 大报》, 통속문예작품, 타블로이드 신문에세이

* 中國 山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助理研究员

小报是中国报纸体系中一种非常独特的传媒样式，之所以称之为小报，一是因为在形式上报纸开张比较小，多为四开、八开，或横四开、横八开，或方型；二是缘于内容上的轻盈灵巧，相较于大报郑重其事的名言宏论，小报对国家大事基本概不与闻，刊载的大多是街谈巷议、琐闻碎事之属。概而言之，小报是一种篇幅短小，以新闻、评论、文艺、娱乐等为主要内容的通俗性大众化报纸。自近代以来，小报始终是通俗文艺生产的重要阵地，无论是晚清时期的花报，民国初期的商业性游戏报，还是1930年代的综合性小报，它们皆关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性事件，反映他们的欲望与哀乐、生活诉求与精神需要，具有浓厚的消闲性、趣味性、娱乐性和知识性。

晚清和民国时期，小报数量繁多且种类丰富，据研究者统计，自清末第一张文艺性小报《游戏报》于1897年6月诞生始，到1952年11月20日最后一张小报《亦报》停刊，短短半个世纪里，上海小报数量达到一千多种¹⁾。1949年5月前夕，由于政局的变动和经济的崩溃，上海一批小报如《辛报》、《诚报》、《沪报》、《立报》、《大风报》等相继停刊。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市军管会规定了《关于上海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要求“所有本市已出版，将出版或将复刊之报纸和杂志，及已营业，将营业或将复业之通讯社，均须依照本办法，向本会申请登记。”申请登记时，须详细填写其历史沿革、财务组织、经营情况、负责人及主要编辑的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及其与各党派和团体的关系等。²⁾当时，申请登记的旧小报有《罗宾汉》、《飞报》、《活报》，而它们均被出版处归为“曾有反动关系”类，未予核准³⁾。新政权最终核准登

1) 秦绍德：《近代上海报刊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95。

2) 《新闻室第四周工作报告》，上海：上海档案馆，1949，Q431/1/1/19。

3) 《填送登记申请书的报纸》，上海：上海档案馆，1949Q431/1/1/196/46。

记出版的小报只有《大报》和《亦报》两种，夏衍认为：“上海小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我们通过改造小报也就争取并改造了小报的读者，这是有比无好。小报办两张，不搞一花独放，这样可以促进他们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留用一批小报文人，也帮助他们及其家属解决了生计问题。”⁴⁾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新政权保留小报主要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即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旧瓶”装上意识形态的“新酒”，达到教育落后市民的目的。

一、《亦报》、《大报》概况简介

《亦报》创刊于1949年7月25日，主办人为唐大郎和龚之方，该报存续三年多，后于1952年11月20日停刊。《亦报》四开四版一张，第一版为新闻，第二、三版为综合性副刊，第四版为体育和影剧。《亦报》的读者以城市中小资产阶级、里弄居民、家庭妇女为主，经营者和生产者也大都隶属于市民群体。报社的采编人员主要是中共接管上海后因小报被取缔、停刊而失业的小报从业者，出身以小资产阶级居多。具体人事构成如下：

工作部门	职别	姓名	性别	待遇	到职日期	从何处调来
编辑部	总经理	龚之方	男	单位440个	1949年7月	
	总编辑	唐云旌	男	单位440个	1949年7月	
	编辑主任	沈毓刚	男	单位330个	1949年7月	唐云旌介绍
	二三版编辑	胡澄清 (又名温那)	男	单位330个	1950年4月	同上

4) 魏绍昌：〈夏衍同志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122-125页。

5) 〈亦报干部花名册〉，上海：上海档案馆，1951，B35-2-101-49。

工作部门	职别	姓名	性别	待遇	到职日期	从何处调来
编辑部	采访主任	徐慧棠 (笔名端木洪、 余爱泳)	男	单位264个	1950年1月	同上
经理部	副理	吴丙章	男	单位242个	1949年7月	龚之方介绍
	副理	沈业儒	男	单位242个	1949年7月	同上
	总务主任	严远闻	男	单位242个	1949年7月	同上
	会计主任	武子扬	男	单位154个	1950年3月	同上

《大报》创刊于1949年7月7日，于1952年3月1日停刊，主办人为冯亦代，编辑有陈蝶衣、陈亮、吴崇文等，社长冯亦代创刊后不久即调往北京工作，后改由李之华任代理社长，陈蝶衣任总编辑。《大报》和《亦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非常相近，也是四开四版，第一版为新闻，第二、三版为小说、笔记和散文，第四版为家庭常识和戏剧，每逢周日增出《周会》及《时事一周》专刊。《大报》在“发刊词”中写到：

本报是一张小型报，在文化工作者的阵营中该是最软弱的一环，难望有辉煌的成就；即使不断的努力，充其量也仅能比拟一支打游击的轻骑队，做一些轻装战斗工作，而且，就是这个工作也没有做的好的把握；不过我们并不因此而自馁，上海是一个畸形而复杂的都市，这个都市里的六百万人又长期而深重地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的支配与影响，上海市因解放而新生了，但上海大多数市民的思想，感情与习惯，可不能立刻就挣脱旧传统旧影响的束缚。一个人的口味尚且难于更改，思想，感情，习惯的改革自然更艰难，于是，我们小小的一点努力，就想在大型报与文化杂志之外，运用一些一般市民容易接受的形式与体裁，不作正面的说教，而作侧面诱导，以便于我们能在伟大的历史转型期中，贡献出微弱的力量。⁶⁾

6) 大报同人：〈发刊词〉，《大报》第1版，1949年7月7日。

《大报》和《亦报》在形式上依然保持旧时小报的编排特色，稿件短小、内容简洁明快，以长篇小说连载、小品文、诗词等为主要内容，虽仍偏重趣味性与休闲性，但品格纯正，态度严肃，扫除了过去的黄色气氛，走市场化路线，但并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高临下。关于小报的具体面貌，我们可以借由平斋(蔡夷白)的《大报开篇》来窥斑知豹：

大报大名天下扬，非复当年小报腔。它是：精彩纷呈看不尽，阵容排列极坚强；一版是：新闻报道精华集，日历天天在上方。底下是：家庭之友人人爱，常识卫生介绍忙。三菜一汤开食谱，免劳主妇搜枯肠。更有那：影剧文娱收笔底，并无黄色健而康。活菩萨，做道场，笑痛肚皮要谨防。二三版：上下古今都论及，大观谁不赞洋洋？其中人海描群怪，秘记伪朝写匪帮。卅载报坛多妙事，忠救内幕出甘棠。西风残照专员丑，不愧老牌恨水张。花事了，田舍郎，金龙殿上话洪杨，正规队伍介绍过，再说那，游击奇兵使火枪。连朝风雨潘勤孟，飞来柳絮小文章。柴室卢公称小品，梅边补白号大王。晚晴资格推前辈，新换好怀陈老羌。刻烛杨澄精考据，茗边手记写风光。雷是响声红是色，雷红大笔名相当。平斋好比货郎担，线尾针头像拾荒。还有那：力士献诗辞意美，达公文虎机锋藏。这真是：三教九流题目广，百家诸子像同堂。不但是：酒后茶余消遣用，说它是：增加知识不夸张。破费了：大饼油条两副半，一样精当有食量；订它个：三年五载又何妨！⁷⁾

《大报》和《亦报》较少采用外稿，作者群基本上是以陈蝶衣、唐大郎的约稿为出发点，基于相同的文人习性、类似的命运遭际聚集起来的，他们汇合于此，每日写满三五百字不等的“小方块”，形成了一个松散又富于弹性的作者群落。在当时报刊媒介趋于一体化的时代语境中，小报开凿出一个吸纳旧文人且具有相对异质性的话语空间，这在建国初期的

7) 平斋：《大报开篇》，《大报》第2版，1950年7月19日。

文学场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就话语体系而言,小报话语既未严格遵照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也不属于知识分子精英话语,而是一种以文化市场趋向为准绳的市民话语,它摒弃了精英文化高尚的精神追求,在承担国家意志的教化之责时也显得模棱两可,甚至有时候还漫溢出主流话语规定的言说疆界,呈现出冒犯性的潜力。

二、小报散文：“身边文学”与“历史掌故”

《亦报》和《大报》的副刊以小品文为主打,篇幅短小,字数大多在三五百字左右,故而是一个版面可容纳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以专栏的形式连续刊出:如余苍(张慧剑)的“工余遣笔”,十山(周作人)的“隔日谈”、“饭后随笔”、“呐喊衍义”,齐甘(徐淦)“亦文章”,柳絮(张廉如)的“柳絮小品”、“小文章”,旧燕(王益知)的“东北人语”,高唐(唐大郎)的“高唐散记”,老鹰(应义律)的“真自由书”,孺牛(陶亢德)的“夜读书”、“日日谈”,汪东(汪旭初)的“寄庵谈荟”,勤孟(潘勤孟)的“风雨谭”,冀野(卢前)的“柴室小品”,闻蛩(金性尧)的“灯下谈”,羌公(陈灵犀)的“述怀新篇”,逸梅(郑逸梅)的“梅边话堕”等。如果从内容上对这些散文小品进行细致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记录身边琐事的“身边文学”;一种是翻故纸堆的“掌故文字”。

(一) “身边文学”

相较于大型报而言,小型报玲珑活泼,没有什么崇论宏议,“刊出的不是反映当前社会的一角,就是作者个人身边有意义或有趣味的琐事,

虽卑无足道，但不失为有内容，有含义，有巧思；更配以生动的文笔，其吸引力也许还远在有些政论之上。”⁸⁾老鹰(应义律)在小品文专栏“真自由书”的序言中写到：“我打算在这儿谈宇宙，也打算在这儿谈苍蝇，谈读书与政治，有时或亦不免要谈游戏与女人，文字呢？或学语堂之语录，或仿鲁迅之杂文，或拟何其芳，或如章衣萍，总而言之，无分载道言志，不拘文言语体”。⁹⁾笔者现随意撷取其中一篇文章：

“四岁的小儿子天真娇纵，我们一家人对他既喜爱而又头痛。他有王戎知李之慧，但无孔融让梨之德，我骂他，他也骂我，我说我要打你，他说：‘我杀掉你！’小手里如拿着什么东西，羹匙，石子，柴片……就会高高举起向我作抛掷之状，吓得我抱头——虽非鼠窜，也要忌他三分，避他一避。连老夫都无可奈何，其母与其小哥小姊小妹之流，更不必说了。然而他虽不爱自家父母兄妹，一见隔壁小芹瑞贞二妹却显得非常热情、柔顺。小芹瑞贞大约都是四岁左右，一个有双美丽的大眼睛，一个有只圆圆的红面孔。吾家小经常逼着其母拉她们到我家吃饭，吃饭时，他把所有好的小菜一羹匙一羹匙的往她们的碗里倒；小嘴里高声的喊着：‘小芹吃！瑞贞吃！’小芹怕羞不动，他就着急起来：‘姆妈，小芹不吃，我要小芹吃！’种种怜香惜玉之状，使其母为之微笑而叹：‘这真是坏种！’坏种二字调子特强，显然对我含有讽刺之意。其实，我自问未尝多情有如吾儿之甚也。”¹⁰⁾

老鹰的文字诚实亲切、幽默风趣、伶俐中透着爽快筋道，描摹小儿情状如在目前。小报上刊载的文章大多是这种无关宏旨的身边琐事和日常见闻：写天气、吃食、衣服；记听戏、访友、买书；家长里短、风

8) 魏绍昌：《逝者如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第144页。

9) 老鹰：〈真自由书·序〉，《亦报》第3版，1949年8月20日。

10) 老鹰：〈吾家坏种〉，《亦报》第3版，1950年9月28日。

土民俗悉收于眼底；街谈巷议、读书偶感皆录于笔端。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庭院花木”¹¹⁾式的文章，也有人称之为“身边文学”¹²⁾，这些文章延续了海派小报休闲性、趣味性的写作风格，形而上的凌空论道少，尘世间的烟火气多，读之可以触摸到市民日常生活的细密肌理。此外，小报版面上描写四时风物、民风民俗的小品很多，富于浓厚的地方风味，如范定(蔡夷白)的〈野浴〉：

说到夏天洗澡，住在大都市里的人不如我们住乡城的，住乡城的人又不如住在农村的。洗澡如在夏天，那是最宜通风所在，露天更好；因为一面水洗，一面风吹，这个汗垢是的确肃清的。大都市里，谁能找到适宜的空院子呢？至于乡居农民那是更可美了，不要浴盆，不要提桶，不要倾入，不要泼去，找个绿荫丛里，清凉河水，老实地向里面一跳，既有洗濯之益，又有游泳之乐。兴尽登岸，打麦场上一坐，披襟当风，始终是一钱不费。¹³⁾

蔡夷白的小品笔触灵动、涉笔成趣，生活之乐洋溢满纸。《亦报》和《大报》上谈吃食的文章很多，时令果蔬、各地小吃、茗肴酒饌时现版面，仅周作人自己就写过无数篇，如〈南北的点心〉、〈腌鱼腊肉〉、〈瓠子汤〉、〈进京香糕〉、〈香瓜〉、〈吃蟹〉、〈甘蔗荸荠〉、〈天下第一的豆腐〉等等，这些充满世俗情趣的文章与其时主流话语对艺术的要求相距较远，以致于主编唐大郎在〈流涎与喷涎〉中不得不提出异议：

去年谈吃到今年。四季东西写欲全。胃口诸君应读倒，流涎以后接喷涎。

亦报有位同志在编辑会议上分析说：二三版的稿子，除去连载文字及

11) 明朗：〈不是怠工〉，《亦报》第3版，1950年10月13日。

12) 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21页。

13) 范定：〈野浴〉，《亦报》第3版，1950年7月25日。

长篇小说占百分之四十篇幅，其余的百分之六十里，谈吃的文字，经常要占五分之一。这些统计不一定正确，不过谈吃的文字，亦报登得弗少，原是事实。

打创刊起，我们就登谈吃文字，现在刊行已经一年，无论登谈吃文字是否相宜，再谈下去，毕竟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譬如这两天再谈菱藕，下去谈栗子，甚至雅到谈莼、鲈，还不都是炒去年那一碗冷饭？难得谈吃，文章又写得不坏，未尝不可使读者流涎，若使得冷饭横炒竖炒，我又生怕读者的胃纳不佳，朝文章吐一笃馋唾，这不是流涎，却是喷涎了。¹⁴⁾

中秋谈月饼、端午话粽子、新茶上市话品茗，年年可用，但因为配合时令，富于浓厚的时鲜感，仍受读者欢迎。在激昂的革命时代语境中，小报上描写吃食的文字显得琐屑而平淡，甚至因年年相似而流于重复，但正是这种扎根于日常生活的书写反而彰显出朴素而恒久的感染力，在多年以后仍能唤起读者似曾相似的味觉记忆。

关于上述“身边文学”的存在价值，曾在小报上引起广泛讨论。《大报》为纪念报纸创刊二周年，曾于1951年6月17日公开征求读者意见，截至6月30日共收到读者来信1000余封。综合而言，对于散文小品，读者的一般意见是希望多登启迪知识的、文笔通俗的作品；少刊谈论书画、吃食一类的文章，少刊重述旧事的翻版文章，少刊人云亦云的响应文章；此外，诗词也十九主张少刊。¹⁵⁾左黄在《论身边文学》中也写到：“以往小型报的稿子，颇多记身边琐事，因此乃有人创为身边文学一名词。其实身边琐事未尝不能记，譬如朋友论学，个人观感，甚至于记载所见所闻，只须一轨于正，用细腻清婉的笔墨写来，亦自有其风趣。若是仅仅写些酒食征逐，或带些黄色的名女人起居注，自然就难免为人诟病了。解放前报上的稿件以后者为多，这一年多来云霾尽扫，颇令读者

14) 高唐：《流涎与喷涎》，《亦报》第3版，1950年9月8日。

15) 《本刊创刊二周年征求读者意见总结》，《大报》第6版，1951年7月7日。

耳目一新。第二三版的稿子就应以侧重趣味为宜。长篇小说和记事不过聊备一格，至于短稿，无非散文笔记小品之类；……写得精的实在不能算多，像闻蛩、雷红那样慢工出细活的新散文，一时恐尚供不应求，况且都是这一类型未免单调。至于笔记，当然以谈掌故翻旧书为大路货，而掌故多经人道，旧书有时而穷，甚或难免枯燥之讥。为了调剂读者的兴味，只须观点正确，便是偶而写写身边，我想倒也是无伤大雅的。”¹⁶⁾ 闻蛩(金性尧)则主张身边琐事“应该与美好远景结合起来，也就是建立从身边琐事到美好远景这一写作基调。”¹⁷⁾

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小报是非主流文化的一种话语叙事，从表面上看是迎合市民所谓低级趣味的世俗、消遣、娱乐的文字，但如果从社会深层意义上来，小报这种话语系统，则反映了市民文化对于政治权威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抗和解构。”¹⁸⁾ 小报的话语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无生机、等待主流话语填充的简单容器，其所秉持的市民话语无法被政治革命彻底同化、湮灭，总是试图在一体化空间的缝隙处努力开凿。小报散文充满个人的生活欲望，渗透着平凡人生的悲喜，虽“卑之无甚高论”，但这些无关宏旨的叙写却在“战歌”与“颂歌”的年代保留了个人话语空间，展示出意识形态符号表象掩盖下的现实肉身。这些写吃食、民俗、服饰的文字，在阶级话语弥漫的年代记录下人生平凡而实在的一面。小报文人的“身边小品”，无意追求过分拔高的精神信仰与抽象冰冷的阶级话语，而是以点滴琐事执着于现世的悲欢和肉体的寒暖，念兹在兹的是市民平凡琐碎却广泛细致的日常生活，正如某甲(陶亢德)所说：“好的身边琐事文章之好，是能反映出中国式的生活。”¹⁹⁾ 从叙写身边琐事的小报散文中，

16) 左黄：〈论身边文学〉，《大报》第3版，1951年3月7日。

17) 闻蛩：〈琐事与远景〉，《大报》第2版，1951年7月13日。

18) 洪煜：《近代大众传媒与城市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3页。

19) 某甲：〈中国式生活〉，《亦报》第2版，1950年8月2日。

我们可以照见人们的生活在时代转型中的悄然蜕变，从这个意义来看，小报散文具有较高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价值。

(二) 掌故文字

小报上闲谈历史的掌故文字很多，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和知识味。这些文章记录了丰富翔实的史事史情，收存了不少轶事趣闻，同时在叙述中又融入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及进程的分析、感想和见解，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小报上的掌故文字继承了清代考据学注重理性、讲究证据的精神，有着江南士大夫的学究气。如余苍(张慧剑)的“工余遣笔”专栏多写历史掌故，像〈死在贤良寺的李鸿章〉、〈王瑶卿的昆仲〉、〈关于曾国藩的纳妾〉、〈鲁迅到嘉业堂买书趣事〉、〈一九四五年九月南京记事〉、〈李大钊先生的被捕与被害〉、〈中国政治人物文学人物与《茶花女》〉、〈闵妃惨死记〉、〈曹雪芹〉、〈西太后杀肃顺案〉、〈梁任公与陈叔通〉、〈《孙逸仙传》中的资料〉等，张慧剑胸罗极富且文字简净大方，写人述事详微博采，考证精当，可谓既有史实又有史识。小型报对于清代故事的刊载数量颇多，如依群的〈记溥仪〉、〈刘铭传这个人〉、〈戊戌政变的一个小丑〉，雯子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白朴的〈张佩伦的无耻〉，瑜寿的〈赛金花故事编年〉等等，清代末叶内忧外患、错综起伏的政局，以及官僚腐败昏庸、倾轧斗争的内幕，为小报文人臧否历史人物、窥视宫闱秘辛提供了谈资。此外，还有何心的〈《水浒》研究〉、〈《红楼梦》抉误〉，金曜的〈北京史话〉，龙溪的〈炉边谈往〉等以考证为主的散文，彰事实、明是非、求真理，文白夹杂、叙事古雅。

这些历史掌故和考证文章与当时“新的人民的文艺”对阶级话语的强调不同，它们缺乏“文学反映现实、紧跟政治”的时代焦虑，更多地

流露出的悠然谈议历史的闲远的精神姿态，以及由此而生的某种知识与智慧的愉悦。以散文笔法记述历史人物、典章故实、文学学术，尤其是存录一些鲜为人知的隐情内幕、趣闻轶事，在中国文坛古已有之。历代上这一类文史掌故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构成中国古典散文的一个重要分枝。小报空间中“掌故文字”的大量出现亦有其特殊的原因：政权鼎格之际，小报文人对新的话语形式、新的“颂歌美学”无法短期习得，因此“故纸堆”成为他们稍可挣脱政治束缚的园地，某种程度上可谓“逃避现实之一法”。

总的来说，小报散文主要是日常人生的体味，内心感慨的吟咏，故人往事的怀想，文史掌故的漫谈，注重个人感怀和艺术经营，大多带有避重就轻、苦吟低唱的别一格调。它不追求崇高，即使语涉阶级革命，也多从市民立场出发、从具体事象的感受出发，并未对社会政治进行深刻而严肃的认知和思考，带有强烈的个人化、世俗化、生活化色彩，甚至有些插科打诨、皮里阳秋的笔墨还曲折地传达出对社会主流话语霸权控制下压抑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尚等有所不满的异质声音，而恰恰是这些嬉笑怒骂的游戏笔墨可能使得国家政治权威在其讽刺调侃的话语系统中不断受到冒渎和侵蚀。

三、连载小说：通俗文艺的当代延续

除了散文专栏以外，小报媒体空间中连载了很多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如张爱玲的《十八春》、《小艾》，王小逸的《疗愁花》、《彩虹桥》，张恨水的《西风残照图》、《醉春风》、《万象更新》，田舍郎的《花事了》，孙了红的《绿色之烛》，鱼双修的《顷刻花》，卢冀野《金龙殿》、《齐云楼》，

李薰风的《百花齐放》、《丹凤朝阳》，张恂子的《侠骨红妆》等。这些故事多以趣味吸引读者、以传奇回避过于宏大的政治命题。其中，张爱玲的《十八春》和《小艾》研究得较为充分，而其他的文本则基本无人问津。笔者将这些边缘文本纳入研究视野，并不是说其文学成就有多高，也不是说文学史对它们的无情埋葬使我们错过或遗漏了多么了不起的作品，而是希望借由“他者”的角度，也就是被“新的人民的文艺”所排斥的、相对处于文坛边缘的旧文人的角度，考察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中被压抑、规训、整肃的声音。通过对这些“文坛失踪者”声音的寻找，真实地呈现建国初期新旧文艺驳杂、错位、胶滞的真实状态。²⁰ 小报副刊空间刊登的连载小说数量庞大，囿于时间和精力的缘故，难以对其进行一一评析，这里仅择其代表性文本做挂一漏万的考察。

（一）惊险小说

孙了红是中国现代通俗侦探推理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侦探小说创作方面与程小青齐名，代表作有《血纸人》、《三十三号屋》、《鬼手》、《紫色游泳衣》、《蓝色响尾蛇》等，他一生蹭蹬，最后于1958年潦倒去世。1951年1月3日，孙了红的侦探小说《绿色之烛》开始在《大报》连载，氛围神秘又诡异。一个阴冷的雨夜，“我”接到朋友吴涤生的信，前往他家亲眼目睹了他离奇的死亡，这出骇人逼真的鬼剧，一度让“我”以为世界上真的存在“冤魂索命”。孙了红调动了很多常见的恐怖元素，如鬼气森森的洋楼、歇斯底里的病人、摇曳的绿烛、诡异的谈话、刺眼的祭品、相框中穿玫红旗袍银色高跟鞋的女子等，气氛扑朔

20) 布莉莉：〈从小报文人角度重审建国初期的文学场域——以《亦报》《大报》为考察中心〉，《百家评论》，2018年第2期，第86-96页。

迷离、毛骨悚然。据“我”的朋友——侦探“狄弥”调查，这里面并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现象，只是被人精密设计的一出鬼剧而已，“世界上根本并没有鬼，有之，那只出于聪明人的制造。而聪明人的所以制造鬼，一定有其潜在的理由。进一步，也可以这样说，那些制造鬼的聪明人，他的本身，就是一个鬼。”²¹⁾小说中所谓“索命的女鬼”玫影，是吴涤生的亡妻，她生前是一个舞女，受吴涤生及其婶母的精神虐待而死。孙了红沿袭了侦探推理小说中“悬念——反转——突变”的叙事模式，布疑阵、栓扣子、抖包袱，使得剧情譎奇多变，捉摸不定。但是，有时为了过分追求情节的离奇而勉强铺写，生造痕迹比较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与连载小说的传播形式有关，与单行本小说不同，报刊连载小说多是边写边登的，因此小说的创作和构思都会受媒介传播的影响。为了吸引读者，作者在每天一段的结尾处，一般会安置一个“关子”，以使天天有高潮，段段有伏笔。这在形成岗峦起伏、险峰迭出的阅读效果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小说结构的拖沓，不够紧凑。

饶有意味的是，孙了红在小说中借虚构人物之口对自己侦探小说家的身份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写到：“‘侦探小说家’！这个下作的‘头衔’，使我听着，感到一种有份量的不愉快！我一直在想，有一天，朋友们肯发发慈悲，把我这头衔取消，我相信，我在被送进火葬场的一天，我的脸上，一定会因此而留下点微笑的！”²²⁾“我诚然是无聊。可是还有比我更无聊的人，袭用了我的名字，编成了最恶劣的书籍，广泛地在毒害人家。……以后，我当改变作风，好好的写些正当的东西。假如能力不够，我宁可饿死，也将永远放弃我这无聊的笔杆！”²³⁾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了红

21) 孙了红：《绿色之烛》，《大报》第3版，1951年1月4日。

22) 孙了红：《绿色之烛》，《大报》第3版，1951年10月17日。

23) 孙了红：《绿色之烛》，《大报》第3版，1951年5月20-21日。

等旧式文人对自己的“晦暗”过往始终耿耿于怀，试图否弃旧我以融入时代和主流话语的努力。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旧文人承担着“新的人民的文艺”在舆论方面的污名与打压，被指认为使人堕落的“毒药”²⁴⁾，在价值序列中被贬抑为负值，侦探小说家在道德上亦处于自卑与矮化状态，这种强烈的“罪感意识”所带来的自惭形秽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复现，成为知识分子反复检讨的原罪。

(二) 都市言情小说

1950年10月16日至1951年1月7日，鱼双修的长篇小说《顷刻花》于《大报》逐日连载。男主人公姜绍文是一个医生，在一次治病的过程中，在人群中看到“一个身穿淡蓝绸长旗袍，肉色丝袜，白皮鞋，面貌楚楚动人的女郎。姜医生睇视半晌，不觉呆了。她的一张苍白瘦削的瓜子脸，脂粉不施，却浓浓涂上玫瑰色唇膏，画出菱角似的小嘴来，凄艳绝顶。她的眼睛是圆而大的，惶惑地对着众人；她的头发披在瘦削的肩上，又浓又黑，半遮着薄薄的脸，像乌云衬托出皎皎月，把一阵凉意带到姜医生的心中来。”²⁵⁾姜医生对这个柔弱的女郎一见倾心，觉得她就是自己理想的爱人。小说中有很多意识流的文字，状绘了姜医生对女郎的想象与爱慕，颇有施蛰存《梅雨之夕》的味道。后来，姜医生每天傍晚下班后去女郎戚水仙家里给她打针，在互相接触中两人感情渐渐升温。但是姜医生在得知戚水仙的复杂身世后心理很矛盾，戚水仙自幼父母双亡，由姨母抚养长大，后来到上海读书，在一个舞会上被富商少爷杨士俊看中，失身于人，后遭厌弃，已怀有身孕的她只能去做歌女，后来又不幸染上肺

24) 陈寿恒：〈辨味的工作〉，《人民文学》，1951年第6期，第37页。

25) 鱼双修：〈顷刻花〉，《大报》第3版，1950年10月17-18日。

病。姜医生很怜爱她，但是循规蹈矩的他又很介意她的过去，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当的男子，他所娶的也应该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好女儿”²⁶⁾。戚水仙为了方便与姜医生结合，同时也怕肺病传染给自己的子，遂将孩子交还给生父，但此时姜医生对她的爱意已退，把精力转向原先并不喜欢的护士徐珍身上。

不难看出，《顷刻花》是一个通俗而老套的都市言情故事，如果我们将其与张爱玲的《十八春》做对照阅读，会发现二者在叙事模式上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皆蕴含一个三角恋结构，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十八春》有一个光明的结尾——顾曼桢、沈世钧和石翠芝等人，怀着美好的憧憬奔赴沈阳，豪情满怀地加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大军。虽然鱼双修在小说《顷刻花》的最后也嫁接了一个颇有政治色彩的尾巴，但女主人公却寂寞地死去了。戚水仙爱情受挫后，决定去省外改造自己，“我笑我自己，一向只是钻在一个小圈子里，肩上背负了许多包袱，思想上又背负了许多包袱，我永远要感谢朋友们的启示，现在我改造了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一面工作，一面治病，我觉得我在短短的时期中，精神上、健康上已坚强了许多……过去仿佛是一场梦——好梦也是噩梦；现在，我从梦中醒来了！”²⁷⁾最后，姜医生与护士徐珍订婚了，在订婚后一天，姜医生接到了戚水仙的第二封信：“信封上是戚水仙的笔记，信里却没有信笺，有的只是一纸报丧条，姜医生抑制不住心脏的剧跳，当他看清楚那报丧条上的姓名时，他感到一阵晕眩，摇摇晃晃的倒了下去……”²⁸⁾

这个结尾颇耐咀嚼，如果按照左翼文学的书写模式，唱靡靡之音、

26) 鱼双修：〈顷刻花〉，《大报》第3版，1950年12月5日。

27) 鱼双修：〈顷刻花〉，《大报》第3版，1951年1月7日。

28) 同上。

思想落后、爱情受挫的戚水仙去外省改造后往往会获得新生，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一般来说身体也会在劳动中变得健康结实。但是小说《顷刻花》却颠覆了以往的写作惯例，戚水仙虽然认识到了过去思想的落后，但最终却寂寞地死掉了。这种感伤的、模棱两可的调子与新的意识形态对文艺的要求颇有距离，甚至可以说小说以戚水仙之死戳穿了主流意识形态比附历史理性所作出的政治想象：政治改造无法平息恋爱受挫所带来的伤痛，也无法疗救一具残破受损的肉身，这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多少是有些政治不正确的。

(三) 黑幕小说

《亦报》、《大报》上的暴露文字很多，如万峰青的〈三C传〉、〈天堂内幕〉、〈新捉鬼传〉，黄化的〈杜鲁门正传〉，废然先生的〈如此美国〉，湘波的〈魔影幢幢的好莱坞〉，黎明的〈女妖郑毓秀〉，沃丘仲子(费行简)的〈哈同与爱俪园〉、雷五的〈蒋家班的活剧〉、山公的〈伪朝秘记〉、陈方的〈飞贼陈纳德〉、王嘉的〈美国文坛怪现状〉、旁观客的〈妖妇蓝妮〉、苏式(金性尧)的〈阿麦酋长日记〉等。这些文字与主流话语口径一致，不可谓政治不正确，然而对“蒋匪”、“美帝”的一味丑化和谩骂，走的却是旧小报讽刺和揭露社会、政界、军界黑幕的老路。黑幕小说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拿手好戏，小报文人在此极尽戏谑调侃之能事，抉摘旧社会弊害、暴露敌人阴私，更多地呈现出旧小报的底色。以万峰青的〈三C传〉²⁹⁾为例，该文以史传式的书写对国民党军统三巨头戴笠、郑介民、毛人凤做了辛辣讥嘲，意在激起人们对旧社会的仇恨。笔者猜测万峰青应

29) 《三C传》在《亦报》连载后，于1950年7月又出版了单行本，改名为《三凶传》，初印5000册一周即售罄，亦报社不得不赶制二版。

该是详知内情的专业人士，里面揭发了很多军统纳赃受贿、结党营私、垄断资本的秘闻，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和文献学意义。

据《大报》编辑吴承惠回忆，《大报》的“宣传口径以《解放日报》为榜样，重要报道送到《解放日报》去审。那时我们办报都守住两条底线：一是歌颂新社会，二是痛恨旧社会。”³⁰⁾但就具体的办刊实践来看，小报的内容更多偏重于描述旧社会的丑恶，对形构新社会的主体性缺乏经验。新的时代要求艺术作品反映新的人物以及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但小报上很多作品仍停留在对旧现象与旧人物的描写上，对新生的或正在萌芽的新事物与新品质着墨较少。1950年10月，小君指出：“整个亦报一般的还显得灰暗，用新文艺的理论来说，就是暴露黑暗的多，歌颂光明的少，比如蒋匪帮的许多人物，当然这些人物是值得诅咒的，谈得太多又不免有过分抬高其身份之感，今天人民的事业与这些人的关系极少，这些人已不足以影响人民事业的发展，这些人已离坟墓不远了。”³¹⁾“黑幕小说”以恶作为书写向度，通过对“他者”痛快淋漓的笑骂，试图贴合主流话语的要求，但是这种“骂的狂欢”仅仅指出了旧社会肌体的毒瘤，并未在对过去的批判上提升出未来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本质尚未真正建立，相较于打到一个旧世界，主流意识形态诉诸于文学的毋宁是通过叙事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因此“破”与“立”在价值天平上并不是等值的。此外，读者在这阅读这类黑幕文字时，也容易因猎奇心理沉迷于“窥看”的快感，并未询唤出主流话语所要求的新的人民主体性。

30) 石伟杰：〈吴承惠谈1950年代初的上海小报〉，《东方早报》第A02版，2016年3月20日。

31) 小君：〈我的意见〉，《亦报》第2版，1950年10月11日。

四、小结

《大报》和《亦报》作为20世纪上海小报旖旎风光的最后留影，在1949年后的报刊格局中占有非常独特的位置。不同于当时党报、机关报冷硬、枯燥、刻板的面目，《大报》和《亦报》同人合资办报、民间商业经营的模式，使其在阶级话语的合围下，以相对多元、宽松的话语空间为一批处于“新的人民的文艺”阵营边缘的文人群体提供了发表园地。他们在此或叙写身边琐事、或沉湎于历史故实、或流连于四时风物、或寄情于书话品评，这些充满世俗情趣的文章虽“卑之无甚高论”，但却在“战歌”与“颂歌”的年代以消闲性、趣味性、娱乐性的小报底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学保留了难得的都市感性，也为我们了解1950年代初期上海市民的生活情态和思想状况提供了鲜活的文本。

▣ 参考文献

- 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 孟兆臣：《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铁报》，学苑出版社，2015年。
-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出版史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009年。
- 杜英：《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上海，1949—1956》，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王秀涛：《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
-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张涛甫：《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 庄培蓉：《迎合、背离与反思：梅娘1950年代作品研究——以《亦报》、上海《新民报》晚刊和香港《大公报》上的作品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 巫小黎：《上海解放前后党内有关小报的调研报告》，《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2期。
- 祝淳翔：《唐大郎及其伙伴们》，《书城》2015年第4期。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Tabloid' s Literature of
Shanghai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 Centering on *Yi Bao* and *Da Bao*

Bu, Lili

The media space of tabloids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the so-called “literature by my side” recording daily trivia and “anecdotes” rambling about histor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that conforms to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habits of the citizens. They all contain literary elements that are heterogeneous to “literatur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ch as the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Literary School and the popular Shanghai Style Literature). Instead of being reorganized and incorporated, they survived and existed in silence in a marginalized and latent manner, which made them stand as a limited rivaling force against the “new people’ s literature”, with a vast disparity in strength between the two.

Key Words : *Yi Bao*; *Da Bao*; popular literature; tabloid’ s prose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1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30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0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